“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上)

费孝通

文明的话题

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新现象。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主导的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往。对这种广义的全球化趋势的关注与研究,也是从19世纪开始的,比如卡尔·马克思就关注过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原始积累的过程。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探索,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这种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当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各种交融和冲突屡见不鲜,全球化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对我们构成了多种多样的挑战,对此,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做出了种种反应。我本人近年来对“天人对立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潮的评论,就是对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不是哪个单一的国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都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

时代的呼唤

近二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在世界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但在面对全球问题的时候,西方的一些基本思路,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在解决某些问题

的同时,又引发一些新的矛盾。比如,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大大地膨胀起来,“西方至上主义”、“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思潮,成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也是造成很多国际性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世界上极端主义和以暴制暴所造成的种种事端,依然摆脱不掉“以我为中心”的影子。

因此,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要认真深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必然会碰到诸如文化、文明、人性、族群性等基本概念,会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样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在探讨文化交流时,常会牵扯到对文化的基本定义;在对各种文明基础和特质进行研究时,也要谈到关于“人”、“人性”这些更基本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比如人类学者对文化、传统的理解,社会学对社会群体结构的理论;民族学对族群性的解释等等,都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我提及这方面的话题,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某种结论,而是希望我们在探讨、研究问题时,要把眼光放开、放远一些,思路变得灵活、广泛一些,不要总局限在一些常识性的、常规性的和偏狭的框框里。在探索关系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宏大的、长远的课题时,我们的思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感;要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优势来进行研究。

人类每逢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出现各

种各样的所谓“圣贤”，其实，这些“圣贤”就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我曾经把当今的世界局势比作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又在呼唤具有孔子那样思想境界的人物。我确实已经“听”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唤。当然，今天的“圣贤”，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种文明或某一个人物来担当，他应该，而且必然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晶，是全体人类“合力”的体现。

近年来，在讨论全球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还提出了“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

后来，我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经验性研究 (empirical study)

研究文化和文明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和取长补短。作为一名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工作者，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在对全球化和文化、文明的关系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体会。

我的学术生涯，大约是70年前从广西大瑶山开始的，那次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的研究

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对我一生学术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大家在关注探讨全球化和文明的问题时，如何拓展我们的研究方法。今天，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是由于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解决。也就是说，用原有的思维逻辑，原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已经不行了。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地做实地调查。要超越旧的各种刻板的印象 (stereotype) 和判断，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 的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体系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的理念。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必须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构建起新的更广博的知识体系。

为什么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呢？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又是多变的、富于创造性的，它决不是只有单一文化背景和有限知识和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想像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深入到你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反映出研究者的一种心态，就是你是不是真正要去理解、接受“他人”的文化、文明，这种心态正是今天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一个关键。深入到“异文化”中去做调查，努力了解“他人”的语言、传统，做到设身处地地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对“异文化”的尊重和对“异文化”开放的心态。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平等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交流和沟通。

可以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试图坚持走实地调查这条路。当我70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时，虽然已经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长期地、深入地去观察某一个具体的社区或社会现象，但是，我每年仍然要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各地做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使我受益匪浅。

心态和价值观

从学术史上说,这种实地考察的实证主义,是我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马林诺斯基在上世纪初提出的。1914年至1918年间,马老师通过在西太平洋 Trobriand 岛上参与和观察当地土人的生活,从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一贡献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人文价值上的,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进化论思潮,把殖民地上的人民看成是和白人性质上不同、“未开化”的“野蛮人”。马老师却号召人类学者到那些一直被认为是非我族类、不够为“人”的原始社会里去参与、观察和体验那里人的生活。马老师使这些“化外之民”恢复了做人的地位和尊严。

在马老师强调和提倡田野工作之前,即使像弗雷泽这样的人类学大师在搞研究工作时,也主要是依靠查阅各种游记、笔记、文献资料。这种大量利用间接观察、间接记录、多手转达的方法,很容易因为观察者视角不一致、信息不连续和不完整,使研究者做出错误的解释和结论。实地调查能够促使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参与观察”,使“人类学走出书斋”,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

要进行跨文化的观察体验,还必须具有一种跨越文化偏见的心态。由某一种文化教化出来的人,因为对“他文化”不习惯,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曲解,对“他文化”产生偏见(prejudice),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则必须具备更高的见识、更强的领悟力,能够抛弃这种偏见。我特别提到一个“悟”字,这个字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当中,乃至他们的思想中,能设身处地地像他们一样思考;同时,又要求研究者能冷静、超然地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在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心态下,去真正体验我们要了解的“跨文化”的感受。我认为,在讨论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具体的研究方法等技术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还是研

究者的心态。

其实,我们平时常说的“凡事不要光想着自己,要想到人家”这句话,就很通俗地说出了在跨文化研究时所持有的心态。这句话是中国人一个传统的、十分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类似的“原则”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还有很多。我想这些“原则”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融汇百川,不同文明兼收并蓄而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或许能够对我们社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培养这种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心态,是提高每个社会工作者人文修养的一门必修课,应该把这方面素质的提高,作为对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基本要求。如果再扩大一些,我们能在一般民众中也推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其结果,必然能够增进不同文明中普通成员之间良好沟通、交流和理解。如果这种沟通、交流和理解能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今天世界上诸多民族和文明之间的矛盾、偏见、冲突以及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等等就有了化解和消除的希望。

交融中的文明

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造成了其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论等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潮。但与此同时,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像马林诺斯基这样的,对西方文化中自我中心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和反制的学术流派。这种反思,可以说就是“文化自觉”的一个表现。然而直到今天,西方社会中各种势力和学术界各派别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激烈的较量。从另一方面看,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冷战、民族解放运动等等磨练后,其社会成员思想和心理都起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其中不乏与“西方至上主义”相对立甚至相对抗的思潮。这个状况,被一些人称作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影响到了今天的世界局势。目前所谓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斗

争”，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之一。

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大量地传播到其他文明中，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传播也变得越来越快了。然而，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西方文化快速传播的同时，西方社会也大量地汲取了其他文明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上的交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些被吸收的“异文化”，经过“消化”、“改造”之后，成了各自文明中新的、属于自己的内容，并从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反映出来。可以说，今

天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日之世界文明，已非昔日历史文献、经典书籍中所描绘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了。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概念化的、抽象的、刻板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 本文是作者2004年8月在“北京论坛”上所做的书面发言，本刊分两期刊载。

廉政没有神话 反腐不信大话

陈鲁民

这些年来，目睹一个个官员腐化变质，耳闻一处处阵地失守“沦陷”，确实叫人痛心疾首，因而大家也总幻想着能找出一两个风清气绝人皆正人君子的世外桃源，以给世人示范，给自己信心。所以，苏州“百官共廉”的神话曾经让我们为之惊喜，眼前一亮，自以为终于发现廉政建设的“葵花宝典”；而联合国“三十年不出腐败现象”的大话更让我们无限神往，津津乐道，以为找到了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

不料，神话还没有传说多久，美丽的花环上还带着露珠，就曝出了苏州“副市长姜人杰被双规”的大新闻，涉嫌金额达上亿元，而且，拔出萝卜带出泥，自从他“出事”以后，他周围的人也开始一个个“出事”。于是，苏州的大街小巷，出租车上或茶馆中，举城流行着百姓自嘲的闲言：“不出则已，一出就出个大的！”而曾经让我们心向神往的廉政净土联合国，眼下也正被腐败丑闻闹得焦头烂额，破了其多年光彩照人的“不坏金身”，让人扼腕叹息。

其实，细想想这也不奇怪，哪个地方有利益，就必有趋利之徒，哪个地方有漏洞，就肯定会有人投机钻营。物必腐而后虫生，臭鸡蛋多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苍蝇成堆。人非圣贤，用西方的俗语来说，正所谓“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

美国有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就叫《总统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是要使人们努力克服心底恶的一面，使“魔鬼”的基因不会成长壮大产生恶变，使那些握有公权的官员们想贪而无法贪，想贪而不敢贪。

多年的反腐败斗争经验表明，权力太大，油水太厚，缺乏监督，制度不严，是产生腐败现象的四条重要原因，也是孵化腐败分子的最佳温室、最好土壤。近年来，掌握巨额资金而又缺乏监督的交通部门，屡出腐败大案，多个交通厅长连连落马，特别是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的“前腐后继”，就是最好说明。那么，对症下药，廉政建设最有效也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削权分权，权钱分离，用市场手段取代各种行政审批，再辅之以严密的制度建设和加强监督，才能真正遏止腐败的发展势头。但无论如何永远不要相信“百官共廉”之类神话和风清气绝的大话。

廉政建设不信神话，反腐败斗争不信大话，会使我们头脑清醒，不上当受骗，永远睁大警惕的眼睛，盯紧权力运行的轨迹，哪里有腐败分子露头，就坚决打击，毫不手软，决不留情，还是毛泽东那句名言说得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